

書評：朴元煥，《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》

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4，225頁

孫欲容*

朝鮮人崔溥（1454-1504）所撰的《漂海錄》，為其從濟州島漂流至浙江台州沿海上岸後，在中國見聞的記錄。崔溥字淵淵，號錦南。他在成宗十八年（1487）被派往濟州，擔任追捕逃犯的推刷敬差官。成宗十九年（弘治元年，1488）正月，在他從濟州島返回全羅道奔喪途中，因暴風漂流至中國浙江海域。在漂流十三天後，一行共四十三人於浙江台州府登岸，沿著運河前往北京，最後於同年六月回到朝鮮。在朝鮮成宗的要求下，崔溥於八天內撰寫其在中國之見聞，但在當時可能未出版。¹後來由崔溥的後代子孫將該書重刻出版。崔溥由台州沿海一帶沿運河至北京，對中國江南地區的情況有較多觀察，與朝鮮使臣由陸路往返北京沿途所見不同，因而被視為描述十五世紀江南社會風貌的重要域外史料。²

《漂海錄》首見於中文研究者的視野，在於1986年韓國學者金在先的〈崔溥「漂海錄」與明代海防〉一文，³但在當時並未引起學者的注意。北京大學教授葛振家在1992年點校出版崔溥《漂海錄》以及介紹相關研究，才使該書在中文學界受到廣泛注意。⁴然而，《漂海錄》早在1950年已有相

*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；Email：astra1012@gmail.com。

¹ 目前所知最早的崔溥《漂海錄》版本是朴元煥教授推定於1534-44年間刊刻的東洋文庫本。

² 此部分可參考范金民，〈朝鮮人眼中的中國運河風情——以崔溥《漂海錄》為中心〉，收入中國地理學會《歷史地理》編委會編，《歷史地理》第二十輯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353-372。

³ 金在先，〈崔溥「漂海錄」與明代海防〉，《圓光史學》，4（1986），頁35-47。隔年收入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編，《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聯合報文化基金會國學文獻館，1987），頁197-217。後收入葛振家主編，《崔溥漂海錄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156-171。

⁴ 葛振家於1992年點校出版崔溥《漂海錄——中國行記》，並於2002年重新點校，並加上其三篇初探性質的研究一同出版。另於1995年結集與翻譯中、日、韓、美學者的相關論文出版。

關討論。早期《漂海錄》的研究，將該書視為補充明代江南社會歷史圖像的材料。其後，隨著更多研究者的加入，使討論議題開始擴散，包括明代對漂流民的處置，崔溥的個人思想，以及撰寫《漂海錄》對崔溥的影響等，但對《漂海錄》本身的研究仍嫌不足。直至近年，韓國高麗大學名譽教授朴元煥才重新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版本及內容進行更精細的校對。

朴元煥《崔溥漂海錄分析研究》一書，除了介紹中、日、韓關於《漂海錄》的研究史，且對其版本進行考察，並提出未來研究的新課題。本書為 2006 年作者以韓文出版的《崔溥漂海錄研究》中文增補本，⁵與作者《崔溥漂海錄校注》一書分別翻譯成中文出版，並受到學界的重視。⁶本書結集了作者 2003 到 2005 年間所發表的相關主題論文，及作者於 1997 年對崔溥在中國行程的考察。

本書總共分為四個部分，第一部分「崔溥《漂海錄》研究和翻譯之回顧」分為兩章，分別介紹及評論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研究，及對該書的不同翻譯。第二部分「崔溥《漂海錄》的書志學研究」分為三章，首先就《漂海錄》的版本加以考訂，接著對不同的校勘記做出評價，最後略述在日本的《通俗漂海錄》與朝鮮的《漂海錄》諺解本。第三部分「崔溥《漂海錄》的歷史學研究」同樣分為三章，以崔溥《漂海錄》為中心，討論明代漂流民遣返與情報傳遞、朝鮮人對明代弘治中興的觀察，與明人對朝鮮的認識。第四部分「崔溥《漂海錄》之研究紀行」則綜述崔溥在中國的行程，以及他對明朝的批判及其個人思想。以下以簡述各章內容。

第一部分第一章是作者對於崔溥《漂海錄》前後期研究的綜述。崔溥《漂海錄》自 1950 到 60 年代開始為學界注意。首先由在日本的學者發現，韓國學者隨後開始拓展相關課題。最初注意到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研究

參見〔朝〕崔溥著，葛振家點注，《漂海錄——中國行記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2）；葛振家，《崔溥《漂海錄》評注》（北京：線裝書局，2002）；葛振家主編，《崔溥漂海錄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1995）。

⁵ 原書為：朴元煥，《崔溥漂海錄研究》（首爾：高麗大學出版部，2006）。同年也出版韓文本的崔溥《漂海錄》校注，見朴元煥譯，《崔溥漂海錄譯注》（首爾：高麗大學出版部，2006）。

⁶ 朴元煥校注，《崔溥漂海錄校注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3）。范金民已有對於朴元煥相關研究的評論，見氏著，〈《漂海錄》研究的結晶——評朴元煥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研究〉，《安徽史學》，2015：4，頁160-163。

者，是 John Meskill 與牧田諦亮。John Meskill 於日本訪學期間，經由宮崎市定得知有崔溥《漂海錄》，於是在日本展開相關版本的調查，並將《漂海錄》英譯校注，在 1958 年作為博士論文提交，於 1965 年出版。⁷ Meskill 的譯注，是目前歐美對崔溥《漂海錄》最早且最主要的研究。牧田諦亮在研究十六世紀日本僧人策彥周良《入明記》時，注意到崔溥《漂海錄》，以及日本儒者清田君錦在十八世紀節譯自崔溥《漂海錄》的《唐土行程記》。⁸ 韓國學者高炳翊在 1964 年開始對崔溥《漂海錄》進行專論，並提出研究崔溥《漂海錄》的基本問題。其後，研究主力仍為韓國學者。隨著相關史料的出版，1980 年代開始有更多研究者加入。《漂海錄》除了在學術研究的領域受到注目，此一史料的韓文翻譯以及相關文章在韓國報刊的轉載，也使得《漂海錄》不僅在學術界廣為人知，更向廣大社會推廣。第二章主要是作者對於崔溥《漂海錄》的英譯本、葛振家點校本，以及四種韓文譯本之評述，並指出這些譯本若干嚴重錯誤。

第二部分是有關《漂海錄》書志學的研究。作者調查《漂海錄》在朝鮮時代的不同版本及出版意義，並進行比較，最後討論《漂海錄》在十八、十九世紀的日文節譯本與朝鮮諺解本。第一章中，作者以吳世玉《影印標點韓國文集叢刊》對崔溥《漂海錄》六種版本的解說為基礎，釐清現存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版本，並將各版本重新命名。此前，吳世玉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版本命名並不一致。作者主張因各版本的藏地不同，故應改以藏地命名。另外，由於壬辰倭亂（1592-1598）之故，最早的東洋文庫本（銅活字，作者推斷為中宗後期，1534-1544，高麗大學圖書館有卷一殘本）、陽明文庫本（木板，宣祖二年，1569）、金澤文庫本（木板，宣祖六年，1573）只完整藏於日本，韓國只藏有壬辰倭亂之後出版的三種版本，即奎章閣本（木板，肅宗二年，1676，缺少卷一）、藏書閣本（木板，1725）、華山文庫本（木活字，1869）。作者考察不同版本的刊行過程，指出壬辰倭亂前的三種版本是官版本。陽明文庫本以及金澤文庫本是在崔溥外孫柳希春主導下，通過觀察使在地方發

⁷ John Meskill, *Choe Pu's Diary: 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* (Tucson: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, 1965).

⁸ 牧田諦亮，《策彥入明記の研究》下（京都：法藏館，1959）。

行的官版本。王辰倭亂之後的三種版本，則主要是在崔溥後代刊行崔溥文集時所收錄。作者在第二章將七種版本對校，發現東洋文庫所藏與高麗大學所藏的銅活字本並非同一版本。東洋文庫所藏的銅活字本，應是高麗大學所藏銅活字本殘本卷一校正過的精印本。此外，隨著刊印主體從中央官版、地方官版至私版，刊印的品質下降，文字錯誤也變多。作者更透過中國的地方志等文獻，校刊《漂海錄》中的中國地名。他認為過去未釐清《漂海錄》的版本，提出應以東洋文庫本作為研究底本。第三章作者討論了崔溥《漂海錄》在十八世紀的日文譯本，以及十九世紀的韓文諺解本。他首先校對翻譯本中的錯誤，並藉由分析日本與朝鮮出版崔溥《漂海錄》坊刻與否，討論當時兩國出版文化的差異。雖然日本在十八世紀時有《漂海錄》的坊刻譯本《唐土行程記》與《通俗漂海錄》，但在朝鮮未見《漂海錄》的坊刻本。十八世紀的日文譯本，是 1769 年日本儒者清田君錦節譯的《唐土行程記》，並於 26 年後以《通俗漂海錄》為名再次出版。相較於坊刻形式的日文譯本，韓文翻譯的諺解本則是手抄本，沒有任何序跋。作者推斷韓文諺解本成書於 1873 年，並據封面有「止庵公朴夫人遺墨」，推測此本為朴夫人的手抄翻譯本。不過，由於此書沒有任何序跋，故無法推測朴夫人的身份，朴夫人的諺解本亦非坊刻本。作者認為《漂海錄》在日本與朝鮮出版情形的不同，是出自兩地出版文化與社會情況之差異。

第三部分是以崔溥《漂海錄》為中心，探討相關研究課題。第一章討論朝鮮漂流民遣返的程序與情報傳達。由於《漂海錄》是以日錄的形式寫成，作者透過其中記錄明朝處置崔溥一行人的內容，整理崔溥被遣返的不同階段，以及分析《漂海錄》中所記明朝的公文書，作為明代遣返漂流民程序的參考。此外，作者從崔溥自明朝官員得到的訊息，分析北京與杭州間資訊傳遞的速度，認為當時訊息透過運河頻繁傳遞。第二章討論崔溥所見弘治中興的徵兆。作者認為，若將崔溥的見聞與《李朝實錄》對照，更能代表十五世紀朝鮮人對弘治中興的看法。例如崔溥在被送審問的過程中，由官員謹慎小心的態度，感受到新政的風氣。另外，崔溥也從明朝官員處得知新政內容。第三章是以《漂海錄》中所見明朝人為例，探討這些

人對朝鮮的描述。由明人向崔溥詢問朝鮮事物，以及中國使臣對朝鮮的書寫，觀察明人對朝鮮事物的瞭解與興趣。

第四部分是作者 1997 年對崔溥中國行程的探訪。此中，以隨筆形式分為十個主題，融合了崔溥在中國遭遇的人、事、物，與崔溥的思想，以及崔溥回國後的遭遇。例如崔溥在中國的遭遇，及其對中國江南江北以及弘治朝的觀察，與明朝使臣董越的相遇，和崔溥回國後遭遇的士禍等。

綜而觀之，此書結集了作者多年研究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結晶，不僅完整呈現美國、中國、日本、韓國的相關研究脈絡，並於版本的梳理，以及不同版本間都做了精細的校對。此外，附錄中整理了《漂海錄》中出現的人物表，更為相關研究提供重要參考。本書對於未來研究的深化以及議題的探索，都有極為重要的貢獻。

然則，本書有幾處尚待商榷。首先在於本書架構。本書分為四大部分，前三部分首先回顧相關研究，接著探討書志學、歷史學兩大研究主題。但全書既缺乏對崔溥生平的介紹，關於崔溥漂海經歷以及《漂海錄》的版本資訊也散落或是重複在不同章節。以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版本分析為例，其在本書第二部分才出現，使讀者難以有效掌握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不同版本。例如第一部分提到奎章閣本「僅留存第二、三卷」（頁 30），但又說「又因奎章閣本缺失卷三的原因」（頁 33）。實際上，奎章閣本的《漂海錄》並非獨立出版，而是收錄在《錦南集》中，為《錦南集》卷三到卷五的部分。「僅留存第二、第三卷」的說法（頁 30），應指奎章閣本《漂海錄》的卷二、卷三；頁 33 處所指的「奎章閣本缺失卷三」，是指《錦南集》的卷三，亦即《漂海錄》的卷一。但作者對奎章閣版本的說明，在第二部分的書志學研究才出現。此外，部分內容在本書時有重複，例如《漂海錄》版本、崔溥漂流過程等。若首先交代崔溥的生平、漂海的經歷，接著討論不同《漂海錄》的版本、研究回顧，最後探討相關議題的開展，可使讀者能更清楚掌握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研究脈絡，也更突顯作者在此一領域的貢獻。

其次，在對《漂海錄》版本的討論中，作者認為最早的銅活字本完整藏於東洋文庫，而高麗大學僅存卷一，可視為東洋文庫的殘本（頁 44）。但

經作者比對，兩個版本在內容上有些微差異。他認為這可能是同一版本不同印次的修正本（頁 66）。若是如此，高麗大學的華山文庫藏的銅活字本，是否應該視為另一種版本而非東洋文庫的殘本呢？作者也提到，在他討論的六種朝鮮版本之外，另有 1954 年羅州以木活字刊行的版本（頁 44）。雖然作者主要討論的是崔溥《漂海錄》朝鮮時代的版本，但是由於作者以「崔溥《漂海錄》版本考」為題，是否也應將其列為版本之一？就此觀之，現今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版本，似乎就不只有八種版本。另外作者在頁 30 提及葛振家的點校本時，沒有提及其所用的底本，在頁 80 處更指出，可能要確認葛振家使用的版本是否為藏書閣的版本。然而，葛振家已提及使用的是柳希春的校正本，亦即金澤文庫本。⁹作者在此處的提問，令人不解其意。作者根據《李朝實錄》，認為當初崔溥以《中朝聞見日記》為名上呈，之後才被改名為《漂海錄》（頁 51）。不過，《中朝聞見日記》是否為原本書名，可能有待考慮。因為《李朝實錄》中，「中朝聞見」多指在中國之聞見，¹⁰不一定是指書名。

而且，作者對於《唐土行程記》、《通俗漂海錄》的討論有待斟酌。首先，作者主張應將《唐土行程記》以及之後再次出版的《通俗漂海錄》，統一稱為《通俗漂海錄》，並在文中直接將《唐土行程記》改名為《通俗漂海錄》（頁 100）。作者此一主張的理由是，《通俗漂海錄》流通的時間較《唐土行程記》更久，且「唐土」無法體現原本「漂海」的意涵（頁 88）。此外，作者對於清田君錦對崔溥《漂海錄》內容的評判顯得不以為然，認為他沒有考慮到崔溥的處境（頁 96）。

然而，作者為《唐土行程記》的重新命名，以及對該書內容的評論，是將《唐土行程記》視為崔溥《漂海錄》翻譯本為前提，但卻忽略了《唐土行程記》本身出版的歷史脈絡。更甚者，雖然《通俗漂海錄》可能是沿用了《唐土行程記》的刻本，只將書名改過再印，並如作者所說的在日本

⁹ [朝]崔溥著，葛振家點注，《漂海錄——中國行記》，〈點注說明〉，頁 27。另外葛振家在 2002 年的點校增補本《崔溥漂海錄評註》的〈後記〉中提到，其在高麗大學辛勝夏教授的協助下，讀到完整的崔溥《漂海錄》。葛振家，《崔溥漂海錄評註》，頁 240。

¹⁰ 例如《李朝實錄·中宗朝》，〈十五年（1520），12月14日〉：「以中朝聞見事啓曰」、〈十五年（1540）10月13日〉：「以中朝聞見謄錄，下于政院」、〈三十七年（1542），2月13日〉：「進慰使李霖回還，以中朝聞見書啓。」

流傳更久的時間。然而《唐土行程記》與《通俗漂海錄》終究是不同時空的出版物，出版意義各有不同，不應以《通俗漂海錄》為名，將兩者統一稱之。

另外，作者認為日、朝兩國崔溥《漂海錄》坊刻本出現的差異，體現出兩國出版文化的不同。但是《漂海錄》在朝鮮的出版脈絡，似乎本就與日本不同。《漂海錄》在朝鮮的出版，主要是其後世子孫刊刻先祖的文集，因此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版本。故在十八、十九世紀日本、朝鮮出現崔溥《漂海錄》的坊刻本與否，與其說是出版印刷文化的不同，是否也須考慮此史料在兩地出版脈絡的差異呢？

再者，第三部分的第一、第二章中，作者舉出崔溥《漂海錄》中的內容作為引證，討論包括明代朝鮮漂流民的遣返與訊息傳遞；對明代弘治中興徵兆的觀察等議題，但是對於相關的二手研究較少提及。如此似乎無法明確看出崔溥的記錄，在此議題上帶來何種補充。若能進一步與相關研究對話，相信更能體現崔溥記錄的史料價值。

最後是書中的一些缺漏及翻譯的誤解。書中出現部分年代標示錯誤。奎章閣本的出版年應是肅宗二年（1676），然而書中多處出現年代錯誤的情況（頁 55、57、59、61）。《唐土行程記》的出版年代，應是明和六年（1769），但書中誤記為明和四年（頁 81、82、100）。頁 136 提到成宗十八年，應是成化二十三年，書中誤記為成化十三年。錯字部分，頁 79、81 應是「壬辰倭亂」，書中誤記為「任倭倭亂」。此外註腳的錯誤，頁 84 註腳一應是本書「第二部第二章」，而非「第一部第二章」。另外引用出處的部分似乎稍欠嚴謹。例如頁 11 處提出的崔溥《漂海錄》的出版，未註明出版項；頁 56 引用鄭重元〈題漂海錄後〉之史料未註明出處；頁 97 作者提及清田君錦的國粹主義立場以及引用的史料，牧田諦亮在《策彥入明記の研究》一書中就已提出此看法，引用的也是相同史料，¹¹似乎應加註說明。翻譯缺失的部分。在頁 85 提到《通俗漂海錄》的版本藏地，應是韓國的「國立中央圖書館」，而非日本國立中央圖書館。此外，在韓文原本中的

¹¹ 牧田諦亮，《策彥入明記の研究》下，頁235。

附錄整理了崔溥《漂海錄》提到的中國地名，並以之與中國地方志進行參照，另外還附有崔溥《漂海錄》的研究書目，包括版本、史料出版、翻譯以及相關研究等。然而此二部分中譯本並未含括，是較為可惜之處。¹²

以上是對於書中部分內容的商榷。不過也因作者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細緻的研究，以及其中所呈現出的一些問題，更揭示了未來崔溥《漂海錄》還可以進行的研究方向。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提到，崔溥《漂海錄》在十五世紀東亞史的研究中，作為國際性的朝鮮史料佔有一定的地位（頁 19）。筆者認為，崔溥《漂海錄》的「國際化」，不僅因為崔溥《漂海錄》是朝鮮士人對他國的書寫，其在十八世紀經過清田君錦的翻譯，在日本又被賦予不同的意義，體現了東亞各國間知識的交流與轉化。然而此一轉化的內涵，目前未有深入討論，未來仍有繼續開展的空間。

無論如何，此書無疑是對崔溥《漂海錄》研究的重要參考。作者對於相關研究的梳理，不僅勾勒《漂海錄》研究史的鮮明圖像。作者對其版本的考察，以及十八世紀日本、朝鮮後續出版的討論，使我們能將此一史料置於東亞交流史的脈絡下，再探其新意。

本文於 2017 年 5 月 5 日收稿；2017 年 6 月 24 日通過刊登
責任校對：吳政龍

¹² 此二部分可參考韓文本：朴元燾，《崔溥漂海錄研究》，頁 228-347、348-353。